



1950年,毛泽东、陈毅陪同李明扬(中)游览北京天坛。

似水流年忆沧桑

□ 凌群口述 王炳毅记录

我今年已 80 岁,退休多年,在家安度幸福的晚年。凡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酷爱京剧艺术,擅长扮演青衣花旦,在南京票友中还是有点名气的。2002 年,南京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很是隆重,盛况空前,我乐于为母校献上一份感谢之情,和剧社的伙伴们应邀去彩旗飘扬、热闹非凡的南大校园,演出了传统古典京剧《贵妃醉酒》的片断,纯然是婉约典雅的梅派风格。好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转入正题吧。

人的一生短暂而又漫长,许多往事的记忆积存在我的心底。我常常觉得我的经历是相当丰富的,恐怕很多同龄老人无法与我相比。我在家乡泰州读小学、中学时,就接触过不少新四军高级干部,其中陈老总、朱克靖两位将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了。特别是威而有重、文武兼备的陈毅,简直成为我心灵中的一尊偶像。他和我公公李明扬很熟,交往甚多。33 年前,陈老总在南京与世长辞,我闻讯后痛哭一场。比起这位素孚众望的前辈革命家受到的委屈与摧残,我在“文革”中吃的那些苦头简直就不值一提了……岁月如梭,回首尘影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凡事总得有个头,就先从我的家世说起

吧。

(一)

我出生于苏中泰州的书香名门。我的家是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泰州老一辈人习惯称我们凌宅为凌家花园。40 余年前我国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东进序曲》就艺术性地再现了我的家院。当然,那是在南京瞻园等风景佳地拍摄的,因为到了 60 年代初,我的家乡故居已几次改建,早已面目全非了。在我永难褪色的记忆里,我家门前有过“探花及第”匾额,大门厚实而气派,地面铺以水磨青方砖。听父亲说过,我家祖上出过探花,在古城泰州相当荣耀。我们家离光孝寺不远,有五进房屋,青砖黑瓦,宽敞而堂皇。也许是高墙和树荫遮住了阳光,砖地上、院墙上总是阴湿湿的,生着一片片青苔和不知名的小草。堂屋、花厅、厢房少说有 70 多间,家具陈设雅致,古意盎然。曲折的长廊通向后花园,那儿有假山石、百年黄杨和枝干蟠屈的榆叶梅、腊梅。荷池约亩许方圆,碧水一泓,水面上分布着一些金丝荷叶和菱叶,风乍起时,水面倒映的天光云影便被晃动、抖散,那意境是很美的。陈老总和朱克靖住我家时就常上后花园漫步,思考问题,也常由家父凌广与后来成为我公公的李明扬陪着,在荷池西边的听雨轩内下

象棋、品茶,纵论抗战时局。

何以我家能拥有如此一座庄园式宅第呢?这当然与祖上当过清廷大官有关,而且我的伯父凌文渊也是民国政要。他又名凌庠,号直支,记得是 1876 年生,早年毕业于南京的两江师范,曾随深受晚清两江总督端方信赖的道台刘世衍赴日本,考察大阪的日本第五届劝业博览会达几个月。归国后,伯父又参加策划举办设在南京城北丁家桥的南洋劝业博览会,工作达年余。这次展会规模很大,设十几个分馆,展区内有小火车开行,盛况空前。我读中学时听伯父说:当年鲁迅在绍兴教书时,就曾带领学生们来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伯父因办事勤勉能干而受到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器重。清末民初,一直追随他进入政界,并加入立宪党。民国元年(1912 年),我伯父当选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一年后,他又当选北京国会议员,加入汤寿潜、孙毓筠、杨度等人为首的进步党。伯父善理财,能办些实事,对于议会政争并无兴趣,而且他对北洋首脑袁世凯并无好感,内心最尊崇的乃是真心缔造共和、为国为民的孙中山先生。记得在我能记事时,我家正厅前壁悬挂的是孙中山油画肖像。

20 年代初,我伯父已经是北京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其间两次代

理财政总长。那时，皖系、直系倾轧争斗相当厉害，战争打了几次。弥天战火中，吃亏遭难的不是那些争权夺利的政客、官僚，而是老百姓哪。我伯父是抓业务的，虽说是内阁高官，薪禄丰厚，进出有小汽车，几个保镖跟随，够威风了，但他相对而言尚较为清廉，生活上自奉节俭，兴趣全放在书画艺术上。他书法早年学柳体，后临张迁碑，画宗徐青藤、郑板桥，所绘梅花、荷花独具风格。20年代，我伯父恐怕是北洋高官中较为少有的一位画家。他与同时任过交通总长的叶恭绰都是高官里的“性情中人”，志趣相近，交往也多。

1927年，我伯父辞去官职，在家中深居简出，专心于书法绘画，功底日见深厚。数年后，他改任东方绘画协会总干事、北平国立艺专教授，与徐悲鸿时相过从。《民国人物大辞典》等辞书中均称凌文渊与陈半丁、齐白石、陈师曾并称为京师四大画家。他的书画作品曾在北平和日本东京多次展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我伯父是一位爱国者，晚年热心于赈灾等社会公益事业。他家居北平，心中牵系家乡父老乡亲，几次为遭受水灾的苏中农村同胞作画义卖。抗战时期，伯父拒绝王揖唐、梁鸿志等亲日的北洋政客的拉拢，担任伪职，甘守清贫。他仍热心于教育，曾任北平美专校长。40年代初，他举家迁回泰州，曾在上海中华公学、泰州时敏中学、南京美术学校等校教国文与绘画，兢兢业业。人们很难想象这位白发苍苍、谦和儒雅的老先生竟然曾代理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内阁要员。

伯父于1944年辞世，享年68岁。我对这位长辈一直心存尊敬，认为他是个值得我们怀念的人物。

说完伯父还得说说我的父母。我父亲凌心支，原名广，1894年生于泰州，是我们凌家宅第的核心人物。他比我伯父小18岁。由于家有田产、店铺，又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幼年就过着小少爷生活，有佣人、

保姆关心照料，爷爷、奶奶宠爱，可说养尊处优。但他没有养成什么恶习，相反，他儿时就有同情心，爱找街上穷人家孩子一起玩耍。也许这与家教有关吧，在我记忆里，爷爷、奶奶就一向乐善好施，有同情心，人缘不错。

我父亲天资聪颖，读完私塾后即由家长派人送往南京读书，住在城中香铺营一族亲家里，佣人阿全伴读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1909年父亲毕业于南京上江中学。又过了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商务专门学校银行科。1916年8月，父亲从上海神州大学财经系毕业。他是不愁找不到好工作的，因为我伯父那时已当上北京政府财政部首席参事，在上海、南京的门生、故旧甚多。1917年2月，父亲北上投奔伯父，住进伯父家。月余后，他被安排在北京中国银行管理处任稽核司帐员。他忠于职守，钻研业务，作风与处世为人人都受到我伯父的影响，政治上不算保守，也没有什么野心，尤不喜欢利用其家兄关系攀附权门，追逐高位厚禄。总而言之，我父亲的名利心不强。

他有一个唱京戏的爱好，且能拉一手京胡，悠扬悦耳，常在家里吊嗓子、背台词对白、自拉自唱，自得其乐。正因有这一爱好，我父亲在担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署科员时就因是京城票友而认识了我母亲石慧敏，并在相恋大半年后举办旧式传统婚礼，结为夫妇。母亲是回族人，漂亮端庄，气质高雅脱俗。虽说不是出身于名门世家，只是平民之女，但她受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读女子中学时就爱好文艺，尤爱京剧，又得名师指点，唱得有板有眼，嗓子又甜美，渐渐有了一点儿名气。自清代中叶至民国年间，源远流长的京剧艺术在北京、天津大行其道，自宫廷到街坊民间形成长盛不衰的京派，名家高手辈出，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影响极大，被我们泰州人引以为骄傲的一代名伶大师梅兰芳便是在北京唱红的。虽说如今他已

辞世半个世纪，但他是世界级的艺术大师。

我嘛，也是梅兰芳虔诚的崇拜者之一。当然啰，在儿时我尚不知梅兰芳是何许人。父母婚后生下哥哥凌正和我，兄妹相差两岁。我尚依稀记得童年时代家中朝朝暮暮，京胡板胡曲声、拍板唱戏声时时不绝于耳。父亲、母亲一个拉胡琴一个摆开架步清唱，他俩往往沉醉于家庭艺术气氛。伯父、伯母家里佣人、保姆，乃至登门拜访的客人、同事，都对此赞不绝口，认为我父母懂得调理生活，兴趣高雅。耳濡目染，我们兄妹俩都有了这同样的京剧爱好，且绵延至今……

我迄今还保留着从30年代初北平《京报》上剪下的演出海报，上面印有我母亲石慧敏的赈灾义演剧照，擅演老生的母亲扮诸葛亮，羽扇纶巾，意态潇洒。海报上还印有介绍母亲的一段文字：“石慧敏为京城名票，艺术精湛，所扮演的《红羊传》、《捉放曹》、《失空斩》、《杨家将》诸名剧之主角均取得成功。热心社会公益，急功好义，实为一富有同情心之杰出女性……”评价很高，或许其中有些溢美之词，但身体较弱的母亲多次主动参加票友义演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日寇步步紧逼，窥视华北。许多官宦权贵人家仍乐而忘忧，歌舞升平，不关心国事，且不以为耻。有不少自鸣高雅的上层票友，躲进华屋雅室，忙于自成一统的雅集。他们何曾关心过工农大众们的疾苦呢？我为有这样一位心地仁慈善良的母亲而感到自豪。每当我翻看那一张相伴我70余年的已泛黄的海报，看着母亲的演出照片，便隐约觉得她向我走近，耳畔仿佛还听见她昂然激越又不失圆润醇正的唱腔。慈母音容宛在，她在冥冥中牵系着我的灵魂，永难分开。

当然，我也常怀念父亲。我明白，母亲能常参加行善义演离不开父亲的开明为人。他也是善良的人。有时票友们义演缺少伴奏的琴师，

父亲便坐上黄包车赶往剧场，操起胡琴伴奏，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演出结束后，票友们累了，肚子饿了，父亲往往出面作东请个客，掏钱请大家吃牛肉面加肉包子。就我所知，他的忠厚慷慨颇为认识他的人们所称道。

1927年，我伯父辞官从艺执教后，我父母失了在京城依托，顿觉压力袭来，难以维持小康生活。加上国民政府已定都南京，于是决定南下返回家乡泰州。泰州是个相对闭塞落后的小城，经济萧条，坐吃山空不是事。1928年秋，父亲经友人介绍来到南京，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监察科任中校主任科员。1930年11月他转任金陵兵工厂会计处科长、处长。他办事认真，账目审计严格，且公私分明，私生活上也自律较严。闲暇爱听戏看戏，凡南北名家大牌如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盖叫天、金少山来南京演出，父亲必拉上母亲一起去看戏，纵然票价不菲也在所不计。那时名家演出的一张近台门票往往要二元大洋，而在30年代中期，物价便宜，钱很当用，一担大米也只二块光洋而已。我父母堪称当年的“追星一族”了。

我和哥哥在寒暑假时就来南京，和父母同住租来的位于门西彩霞街的两间老房子里。在我记忆中，城南三山街、夫子庙畸形繁荣，很热闹，是商业区，而在新街口一带尚很破旧，市面冷清，新楼街房后多是水塘、菜地和乞丐流民聚居的棚户区。像金陵饭店、华新大厦原址曾有义民商场，是政府安置东北抗日义勇军军人及家属之地，也就几排木结构平房店铺，出售小百货。商场后面便是水陆杂陈的摊贩市场，污水遍地，又脏又噪杂。我常和哥哥来这儿玩耍，看草台戏班演戏，看民间魔术。那时，我何曾想到六朝古都南京后来成为我和丈夫李广生及三个儿子定居之地，生活的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测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

军兴，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日寇飞机常空袭南京，空战时有发生。下关火车站天天有成旅成师的官兵排队登上军列，军乐队高奏



2001年凌群主演京剧《贵妃醉酒》，时年76岁。

军乐，市民们列阵为军队送行。那同仇敌忾的场面怪感人的。不久，战火向南京逼近，金陵兵工厂西迁四川大后方，遣散了部分职工，我父亲辞职，携家小返回泰州，以躲避战乱。

(二)

1938年春，李明扬的抗战部队进驻泰州，在光孝寺挂出“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牌子，招兵买马，征收税粮，声势搞得蛮大。李明扬对我们凌家另眼相看，站稳脚跟后就登门拜访，受到我们全家的盛情款待。我初次见到这位将军时，他是中等身个，挺精干，操皖北口音，言行举止有标准的军人作派，已近50岁了，穿一身米黄色军服，领章上缀二朵金梅花（代表中将军衔）。电影《东进序曲》中出现的李明扬与真正的李明扬大相径庭。首先，气质就不像。电影中的李明扬一身笔挺的呢子军装，扎武装带，佩军人魂短剑和手枪，并爱戴白手套，威风十足，而且身个高大，方脸蓄唇髭。现实中的李明扬斯文和气，注重边幅，爱穿长袍布鞋。他给哥哥和

我一份见面礼，是各十块银洋，以红纸包着。他拉着我们问了读书情况，笑呵呵的，一派长者之风，令我感到亲切。他得知我的乳名叫小狮子，便笑道：“好闺女，以后就唤你小狮子可不可以？”我并不拘束，点头说：“可以的，李伯伯。”李明扬特别开心。他对我们家的环境布置很欣赏，酒席上他提出欲借住靠后花园的四间厢房（包括书房）作为常用住所，租金照付。我父亲同意他来住，但拒收租金，慨然表示：“李将军率领国军抗战打鬼子，保境安民，实是有功之人，在下自当倾力相助，不分彼此。”

此后李明扬就常住凌家花园，进进出出都有八名挎枪卫兵跟随。我家前后设了两道岗，以保证这位总指挥的安全。有时李明扬在书房里办公，研读军政书刊，副总指挥李长江和丁聚堂、颜秀五、张公任等十余位纵队司令来见他，商议军务。李明扬便叫副官通知我家的管家，置办一桌酒菜款待部属，所需费用实报实销，往往多支付几元。菜肴一般，无非鸡鸭鱼肉、四荤四素，我没见他们享用过山珍海味和高级美酒，抽的香烟也都是“美丽”牌、“红燕”牌等大路货。这些将校除了张公任，似乎都有些江湖气，粗嗓门，言语亦粗俗。尤其是少将副总指挥李长江，与电影《东进序曲》里的角色还真的相似：光脑袋、一脸横肉，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他对下属很凶，动不动就骂人，我就亲眼见他打卫兵和军官的耳光。我父母也都看不惯李长江那作派，私下叫他老兵油子。不过李长江对李明扬却是很恭顺，在泰州城里，恐怕也只有李明扬能训斥他。渐渐地我们一家跟李明扬混熟了，也就知道了二李之间的关系。

李明扬在军界的资格相当老。他出身于萧县农家，早年读过江苏陆军小学，与蒋光鼐、顾祝同是同学。清末宣统年间，李明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清斗争。辛亥年，他随江浙联军的援鄂支队乘

船赴汉口，支援发动首义的武昌新军。不想到达汉口时才知道战事告停，袁世凯已电令清军停止进攻，南北双方谈判。不久清帝逊位，袁世凯坐镇北京，操控北洋实权。没仗可打，援鄂支队只有返回南京。途经九江，李明扬结识了已被推举为江西大都督的老同盟会员李烈钧，应其之邀，同赴南昌。李烈钧赏识李明扬的军事才干，任命他为赣军副参谋长兼湖口要塞司令。以后，他们共同参加“二次革命”和1915年南方革命党人讨袁护国战争。失败后，为逃过袁世凯通敌追捕，又一同东渡日本。李明扬经孙中山安排进入东京帝国陆军大学学习。20年代初，李明扬又与张辉瓒等人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他当上新赣军副总司令，实负统军之责。这支几千人的赣军驻扎于粤北韶关地区，是忠于孙中山的。李烈钧则担任大元帅府总参谋长兼国民党中央常委，辅佐孙中山……我父亲在了解李明扬的经历后更为尊敬他。1922年，蒋介石还未发迹，只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一名默默无闻的上校参谋。前些年，有一位作家在回忆苏中抗战的文章中称，就他所知李明扬是个老教官出身的老行伍，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听来的。他恐怕连《民国人物大辞典》都未查过。这是不够严肃的写法。

至于李长江，当年是凌家花园的常客，我们都有些讨厌他。我父亲私下问过李明扬，何以重用李长江？他坦诚相告：此人有些军事才干，较能打仗，又讲义气，善驭众，并非平庸之辈。我的十二位纵队司令大都服他，愿听他调遣，我要用其所长。而且，李长江救过我的命，常言道：知恩不报非君子也。原来，20年代初，李明扬率赣军在韶关山区剿匪。那帮土匪大多为叛军陈炯明残部，勾结北方军阀，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又打家劫舍，为害粤北。一次激战中，李明扬中埋伏负伤，危难关头，卫队连长李长江手持双枪，带领卫兵们冲杀入重围。他命一卫兵背上

李明扬，他一马当先，端着花机关枪（冲锋枪）冲在前面，救出了自己的上司。此后李明扬破格提升李长江为团长，而在民国初年，李长江不过是赣军一名列兵。1930年，李明扬担任江苏省保安司令时，又让一直追随于他左右的李长江当上驻防江阴的保安三团团长。因李长江嫖赌俱全，纵容部下敲诈乡绅，为害百姓，而遭绅民联名举报。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要求李明扬严予查处，结果李明扬痛斥李长江后，将其解职，两人一度分道扬镳。抗战初，李长江在老家南京组建战地救护卫生大队，自任副大队长。日寇攻下南京后即屠城，疯狂杀戮30万军民。李长江侥幸死里逃生，渡江北上，投奔时在徐州担任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老上司李明扬，获得收留，还被任命为副官兼作战参谋。李长江倒也尽心卖力，帮助组编了几千人的保安部队投入抗战，维持地方治安。我军夺得台儿庄大捷后，日寇主力进攻重镇徐州，李宗仁率第五战区主力部队西撤入皖北，继续对日征战。李明扬颇具战略眼光，他未随五战区大军入皖北，率部下一路南下的沿途收罗散兵游勇，冲过日寇封锁线进入三秦地区，占下地盘，亮出抗日大旗……

我父亲将二李的经历、为人、治军特点都告诉了我 and 哥哥。那时我已有些懂事了，我总是感到李明扬特别喜欢我，夸我漂亮聪明，唱歌唱戏嗓子好，常送我一些小礼品。怎么也没想到七八年后，我与他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独子李广生结婚，成了李明扬的儿媳。命运就是这样令人难以捉摸。

（三）

我最初见到新四军官兵是在1940年的泰州城里。记得是李明扬过50岁生日，场面很大，总指挥部和凌家花园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重庆那边来的特派大员黄逸峰将军，驻扎在兴化的江苏省主席兼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等各方要人都来祝寿。新四军江北支队派出一排

官兵由一位副官带领，抬着由银元拼成文字的贺寿大匾列队进入泰州城，受到百姓们欢迎。那匾上都扎了大红绸结，上边分别书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等6位新四军将领的名字。我发现新四军官兵个个年轻健壮，英气勃勃，步伐整齐。他们都挎着盒子枪，扎武装带。我进而联想到新四军定然训练有素，能征善战，对他们生出强烈的好感，不停地为他们拍巴掌，喊爱国抗日口号。

那时，我父亲已被任命为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部少将参议，但他很少穿将军制服出面待客，常是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新派穿扮。当然有时也穿长褂布鞋。他与李明扬私交甚好，常在闲暇下棋聊天，谈论时局，并为李的总部筹划财务粮税事宜。我一个女孩子，不懂啥军事方略、行军布阵，不过我凭直觉感到李明扬“亲共”，思想开明、进步。他在与我父亲聊天时并不避讳我们兄妹，常称赞共产党有前途，八路军、新四军会打仗，军纪严明，是抗日劲旅。相对而言，他常批评重庆政府缺乏效率，官场腐败严重，蒋介石独裁专断，多次贻误战机，导致国军连吃败仗。他讽刺蒋对军事战略是外行。我父亲说得不多，但常附和他的见解。

在我印象中，李长江反共很坚决，常骂共产党和新四军，郭村之战就是他执意挑起的。二李手下十二个纵队司令中大多数也赞成把新四军挺进纵队赶出郭村，不想吃了大败仗。李明扬为此对李长江发了大火，盛怒之下，攒碎了一只紫砂茶壶。两人在我家花厅里发生争吵，最后以李长江垂头丧气地赔罪而告结束。

黄桥战役前后，陈毅司令员三次来凌家花园与李明扬晤谈，谈些什么我不知道，但从他们的愉快表情可以看出彼此已建立了信任融洽的关系。陈老总有名将之风，豪爽直率，言谈风趣、幽默，他也随我父母和李明扬口吻唤我的乳名小狗子，

亲切得很。我记得他在我家花厅里吟过诗，一口四川官话，抑扬顿挫，有板有眼。与李明扬交谈中，陈老总爱引用中西名贤哲人的格言警句，并作即兴发挥，既有名将气概又颇有诗人气质。李明扬几次对我的父母称赞共产党里人才济济，说陈毅、粟裕是一流将才，还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是中国才俊。那时，新四军挺进纵队一两年里很快发展壮大，已成为苏中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坚持反共的韩德勤部队则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在我家里，我有幸见过新四军的粟裕、陈同生、姬鹏飞、惠浴宇、刘炎等不少指挥官。他们性格各异，像粟裕就比较严肃，话不多。姬鹏飞是搞军队政工的，很有学问，口才不错，爱开玩笑，在我家喜欢与我父亲谈论国内外时局，很有见地。建国后，他曾担任我国外交部长。还有一位朱克靖给我的印象较深。那时他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指挥部派驻泰州二李部队的联络主任。为安全起见，李明扬派几名卫兵贴身保护他，并安排他住在凌家花园里，礼遇较高。他中等身材，一身半旧的灰军装，方脸孔，戴一副度数较深的近视眼镜，温文儒雅，讲究礼节，说一口湖南话。李明扬似乎对他相当尊重，常关上书房门与朱主任谈话。陈老总对自己这位下级也挺尊重。他告诉我父亲：“这位朱主任资格比我老得多呢。他曾留学苏联，就读于东方大学，192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而且他已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这是很了不起的啊。那时候，我陈毅不过是个中级军官。朱主任来泰州前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在皖南军部叶挺军长、项英政委都对他另眼相看。他有不少长处，值得我学习。”陈老总心直口快，说的都是心里话。朱克靖喜欢我们孩子，办公闲暇辅导我和哥哥学习，教我唱俄文革命歌曲，讲他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时的见闻，讲苏联人民和

红军对列宁的拥戴，他总是笑口常开。那时我弄不懂为什么李明扬对朱克靖特别客气，又不便问大人，只有将这个谜搁在心里。

1942年6月，日伪军主力万余人渡江北侵，发动大“扫荡”，日军飞机还朝泰州扔下炸弹。新四军东纵且战且退，退往东台以北一带。李明扬带领总部百余人撤离泰州。日军占领泰州后，李长江率部投降，部队接受改编。李明扬不幸在溱潼水乡被俘，旋被日军押往扬州，他拒不投降，宣告绝食。不久又被日军押往上海，软禁于永安百货公司旁的一座高楼的第十一层。上海人管那儿叫九重天。我父亲凌广表面上好象屈服了，同意担任汪伪苏北行营总金库少将库长兼汪伪第一集团军总经理处处长。其实与此同时，他已秘密地接受重庆政府的新任命，担任国民政府长江下游挺进总司令部京沪区少将策反专员，任务就是做李长江部伪军官佐的策反工作，秘密地找那些被迫附逆的中下级军官谈心，要求他们不忘国耻和民族仇恨，认清形势，相机倒戈，重返抗日阵营。父亲这么做是很危险的，若被奸人出卖，向日军告密，他就性命难保，可能还会牵累全家老小。日本人很凶残，就连投降后当上汪伪第一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的李长江也不放过，在酒宴上下毒，差点要了他的命。李长江此后有职无权，形同傀儡，后悔莫及。部下众叛亲离，几千官

兵愤而投奔苏北新四军，还有许多官兵开了小差，溜回家种田。

1943年秋，李明扬被已与重庆那边建立秘密联系的汪伪权要周佛海保释出来，恢复自由，重返泰州。他仍住我们家，深居简出。他的几万部队让李长江断送了，这令他心情沉重，终日长吁短叹。李长江那时已改任汪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曾拖着病躯上泰州看望李明扬，受到斥骂。我们全家人都厌恶他，冷待他。

(四)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6月，我刚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就嫁给了李明扬儿子李广生。婚礼是在镇江永安酒楼举办的，镇江名绅陆小波担任证婚人。婚后，我们住在上海建国西路息邨二号李公馆，那是一幢西式小楼，二层，带花园。公公总叫我小狗子，婆婆葛素秋待我也很体贴。我们家在南京八府塘也有一处房产，亦是一洋楼，临着大荷塘，垂柳老树掩映，环境闹中取静。我和丈夫广生也常到南京小住。蒋介石坚持打内战，时局动荡，我公公又获起用，被任命为第十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淮南行署专员，但他常借口养伤治病留在上海，有时也住在南京八府塘宅院。那时他已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提供重要情报。他已受到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暗中监视。

由于已是一家人了，闲聊时公公告诉我不少事。他说其实朱克靖



凌群与李广生的结婚证书。

早在北伐战争中就与他共过事,同在朱培德的第三军。我公公是该军第九师中将副师长兼 26 团团长,手上掌握几千忠于他的原赣军官兵。蒋介石密令各军“清党”反共,我公公私下给朱克靖等共产党员通风报信,又帮助九师中王尔琢等一批共产党员逃往汉口。1930年,我公公被降职担任江苏保安司令时,又在镇江掩护过因在河北搞地下斗争而遭当局通缉的朱克靖,让他住在自己公馆里月余,脱险后前往江西苏区……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公公早就与共产党员朱克靖是朋友了。

公公还告诉我:1939年某日,他手下第三纵队司令颜秀五打来电话,说他的部下巡逻时,扣押了外出视察时因与向导走散而误入颜部防区的新四军一支队的陈毅司令及其二名卫兵。颜秀五之意是顶好就地杀掉陈毅等三人,以除后患,为此特作请示。我公公大吃一惊,立即命令颜秀五为两军团结抗日计而放人。而后,出于担心颜抗命,他又骑马驰往颜秀五的指挥部,命令放出陈毅和二卫兵,亲自护送他们回郭村驻地……这事可说公公生前从未向外人披露过,他也叮咛我和广生不得外传。

1946年底,朱克靖奉命去做反正的伪军郝鹏举部的政治工作,却被反复无常又倒戈投向蒋介石的郝鹏举扣押,并解往南京。我公公多方营救未果。1947年10月,朱克靖被杀害于国防部小刑场。我公公为此悲痛流泪,一整天不想吃饭,关上门,绕室徘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公公早前已在徐州贾汪率旧部千余人马起义,这时随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进入上海,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生活上受到陈老总多方关照。我公公过六十大寿时,陈毅和潘汉年副市长等上海党政军领导都登门祝贺。陈毅见了我还是叫我的乳名小狗子,问长问短,很是亲切。后来他又亲自过问

我和广生的就业问题,征求了我俩愿去南京工作的意向,指定一位秘书与江苏省政府联系。这令我们很感动。

记得体弱多病的李长江那时一度住在我们家二楼上。他已显出老态,行走得拄拐杖,终日念佛、读读书报。我曾埋怨公公不该收留下他,公公耐心地给我解释说:他生着病,已经活不了几年了,况且我向政府作了汇报,征得批准才让他住我们家的。公公出钱为他治病,负担他生活费。大半年后,又派人送他回南京老家养病,仍供养他,直到李长江于1956年辞世。

我婆婆于1951年病故,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公公很伤感,决意请求调往南京工作,先后担任过江苏省农林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多种职务。我公公于1959年调往北京,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民革中央常委。他在生活上一直受到陈老总、粟裕、姬鹏飞等新四军老同志的关照。1978年,我公公逝世,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主持了追悼会,悼词中对我公公当年几次帮助过苏中新四军的功绩作了肯定性评价。

我父亲凌广在50年代担任过泰州市政协委员,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1976年9月7日,父亲逝世,终于与先于他去世的母亲永久相

伴于九泉之下了。尘世风雨再也不能够侵扰两位多年相濡以沫的老人了,愿他们安息吧。两年前我哥哥凌正已在台湾辞世。

我在南京市建邺区粮食系统工作,一干二三十年。业余爱唱京剧,为之痴迷,生活很充实。李广生则一直担任中学教师,主教英语。80年代后期他担任过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市政协委员,不仅热心于参政议政,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又曾是市航空协会的骨干。我呢,在晚年担任过南京市建邺区政协委员,京剧艺术已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的三个儿子:渝同、玉玺、玉文都学有所成,早就成家立业。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工作的李玉文近年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又曾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荣誉甚多。这是人民对他勤奋工作的肯定。1999年,我的老伴广生离我而去,但我并不孤单,身边有儿孙们相伴,其乐融融。我们京剧票友的活动一直不曾间断,精神上愉悦高于物质享受。我的晚年生活够幸福了。■

[依据口述记录,供研究参考]

(作者地址:南京市汉中门萍聚村四号楼502室,江苏南京210029)

本栏稿约

主旨:关注“口述历史”,抢救民间历史记忆及口头文化遗产。

体裁:亲历者口述(记录),回忆录,访谈录;附有关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及采访照片。文字长短不限(可连载)。

内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含近现代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经济各业);民风民俗;行业内幕;城市沿革;轶闻掌故;有史料价值的其它内容。

重点:档案中原本少记载或无记载;鲜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尤受欢迎。内容可靠,真实记录。

对象:有关当事人、亲历者(尤重年事已高者);亲历者亲属、后人;熟知内情、内幕者,等等。

欢迎供稿,优稿优酬。并欢迎各界提供报道线索,重大线索酌付信息费。

《档案与建设》编辑部

二〇〇五年一月